

中国古代史论丛

一九八一年第二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史论丛

一九八一年第二辑

本辑特约编辑：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刊编委：

郑天挺 傅衣凌 谢国桢

王仲荦 史念海 张岂之

朱绍侯

中国古代史论丛

一九八一年第二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3.75印张 32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书号：11173·41 定价：1.38元

公必居的材料证明了什么？

北京前门外粮仓原有家著名内膳园，名叫“云

心居”。它后来被公认为是明朝嘉靖年间所买去。我

很早怀疑它的可靠性。然而，人们拿出了证据，那就是

相传为三殿山高写的“云心居”三字匾额。我

疑仍然不能消除。因为那三字匾额上没有年代，

也没有署名，并且字迹模糊，看来早已失去原先的

意义了。究竟“云心居”是什么时候设置的，它的原

廣過程和進步。而有什么特點呢？這些問

題仍有待於探討和解答。

我曾有機會在解放前，去居的老朋友顧永昌先生，

搜集了五居的舊房契九張，根賬一奉，家

立便銀賬一奉，財產趙宅立銀賬一奉，取房租賬一奉，

收買六珍字奉銀賬一奉，

租糧兩奉，另有恤恤金領牌文據五張。這些材料

是清朝康熙年間的，再沒有更早的了。

25×8=200

中国古代史论丛

一九八一年第二辑目录

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天挺(1)

明 清 史 专 号

“六必居”的材料证明了什么?……………邓 拓 刘永成(11)

明代流民运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累

过程……………李 洵(30)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迟缓发展的原因……………谢国楨(48)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林仁川(57)

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果品业商品生产……………陈学文(69)

福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林祥瑞 黄志中(79)

明代均田均粮运动的发展……………伍丹戈(94)

张居正综核名实的思想和他的考

成法……………茅海建 宋坚之(141)

朱元璋与江南地主……………唐文基(157)

明代贵族庄田的土地问题……………黄冕堂(168)

明代勋戚庄田的土地来源和经营情况……………郑克晟 傅同钦(201)

明初垦田数考辨……………董楚平(212)

试论明清时期户籍制度的变化……………刘 敏(218)

徽州庄仆制及其研究……………刘重日 曹贵林(237)

明代辽东都司军屯的情况和作用……………杨 旸(245)

明代云南经济史论略……………秦佩珩(251)

明代福建赋役的特点·····	陈支平(261)
明清德化土地契约的经济内容·····	杨国桢(270)
清朝入关前的民族政策·····	李治亭(286)
皇太极改革综述·····	孟昭信(304)
清代前期三大财政支出·····	彭雨新(324)
试论康熙的经济政策·····	钟安西 楼毅生(343)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	陈碧笙(352)
邓茂七起义的特点·····	张桂林(368)
论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孙祚民(375)
鲁南王俊起义史实述辨·····	王汝涛(393)
蔡牵集团及其海上活动的性质问题·····	孔 立(420)

读史
札记

从一枚银章谈起

王世华(431)

补

资料:

王船山不满明太祖(文廷式·29)明史纪事本末(梁章钜·56)重惩贪吏(赵翼·68)睿忠王致史阁部书(昭槁·93)圣祖拿鳌拜(昭槁·200)论三逆(昭槁·211)田价 米价 银价(钱泳·236)明初文字之祸(赵翼·269)明祖用法最严(赵翼·303)永乐中海外诸番来朝(赵翼·323)明初徙民之令(赵翼·374)藩军初制(昭槁·430)

咏史诗词

咏郑成功四首(连横 林峻堂 邱逢甲·156)吊于谦三首(黄鸾来 孙蕙王式丹·167)过开封怀李岩(夏承焘·244)明清杂咏(柳亚子·260)明季咏史(张笃庆·342)闽于山臧公祠题壁·用岳武穆韵(郁达夫·367)吊史可法六首(吴嘉纪 戴绶年 黄燮清 郁达夫 邓拓 翦伯赞·419)

白

在庆祝厦门大学建立六十周年时的学术报告

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郑 天 挺

这次到厦门来，是为了庆祝厦大六十周年校庆。傅先生让我来讲几句话，不敢当，觉得没有什么可讲。在科研上最近几年没有什么钻研，就介绍一下当前的史学研究情况吧。

一九八〇年是史学界团结的一年。所谓团结的一年，是指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大家开始重新工作，不但比以前做得多，而且比以前做得更好。这一年有四十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多年没有活动的中国史学会，去年又开始活动了。这表示了一九八〇年是史学界大团结的一年。去年举行的国际性会议也较多，是国内外史学交流最频繁的一年。几乎每次会议都有国外同志参加。规模较大的是八月份在天津举行的明清史讨论会，十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历史学者讨论会。这几次讨论会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外交流。中外学者、专家，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行辩论，这种情况是过去少有的。所以去年是中外交流频繁的一年。去年很显著的成绩，是科研成果非常多。具体数字还没有统计。大体上看，这几个方面很突出，胜过过去。首先是解放思想，其次是出现了许多年青的作者。第三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第四是增加了许多过去没有利用过的新资料。总的来说，去年一年有很多突出的成果，并且有不少新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尤其是有年青的人来搞，新的作者、研究者很多是中年、青年。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青年人办的刊物也有。今年，在我个人看来，一定有更加先进、更加新颖的成果出来。一九八一年史学界的新情况，有的我们还不知道。但就现在知道的有几件事在做。一是在全国广泛开展历史科学竞赛工作，一是批判封建主义。北京、天津等地已经进行了，最近在上海也要进行。下个月或者再晚一点就要进行全国性的讨论。还要举行历史的学科竞赛。数学竞赛已经举行了几年，成绩很大。去年胡乔木同志提出历史学科是否也可以举行一些竞赛。所以去年就在天津试了一下。参加竞赛的中学生由各校自己出题考试，录取的送区考试，从中再选出一些送到市里考试。各校保送到区的有五百多人，市里再经过一次考试，取录了三十名天津市的历史学科竞赛的优胜者。对这些优胜者，除了精神鼓励外，还给了一点纪念品和书籍，搞得比较圆满。所以想在全国各地都试着做。历史课不是重点课程，为了打好基础，中文、外文、数学是必要的。历史在各地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以前，高中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只有近代史。古代史在初中一二年级学，经过四年或三年进入大学，重新学习。进入大学的学生对中国古代史感到很难接受。因而在学习上就被忽略，教师在教学中也感到特别吃力。如果有这种竞赛，大家经过复习，对历史学科也就重视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这样悠久，如果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不十分清楚，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句空话。为了使每个青年人爱祖国、爱民族、爱社会主义，就必须使每个青年人对祖国的历史有适当的了解。由于这个目的，我们举办了历史竞赛，各省市今年都要开展。

在今年，大力筹备的有如下几件事：首先要举行的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讨论会。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我们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消息传出后，全世界都很重视。自称为辛亥革命正統的台湾还没有什么动静。他们认为我们和辛亥革命没有关

系。其实，我们完全是继承了辛亥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是一直沿续下来的。正是我们要纪念辛亥革命。今年世界各国有许多人要到中国来参加纪念活动。今年的纪念活动分三次进行。一次在武汉，一次在长沙，在国内其他省区还有一次。我们希望全国都来支持这次会议，踊跃写出论文。与此有关的是民国史问题。民国史，过去重视不够，现代、近代史中只谈一点北洋军阀的事，对辛亥革命研究不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编写民国史，这是一个建设。

另外，教育部也要求继续进行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搞过一次，编写一个断代史——明史。现在准备重新开展，编写断代史，另外还要编制一整套的专史和各国国别史，今年就要着手办。

明年还要召开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纪念会。

另外，美国在明年可能要召开一次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参加。

全国民族史讨论会，原定今年四月份开，还没有最后确定日期。这次会议将邀请全国民族学家参加。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虽然文章已经发表了很多，但意见还不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研究民族史？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十年动乱中，这个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反映很强烈。建国初期，认为凡是现在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不是外来的。第一次全国人大时，满族代表提出了清代为什么要叫满清，而汉人建立的朝代为什么不叫汉明等等。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我们中国，国内各民族是平等的。过去没有人叫汉明，唯独称元朝为蒙元，清朝为满清，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歧视情绪。现在国内所有的民族应该认为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所以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华族”这一提法。十年动乱时期有的做法很不好。究

竟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过去没有深入讨论过。少数民族算不算外族？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看，外族应该是指疆域以外的民族。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连带的问题。比方民族英雄问题？在国内的民族斗争中是否存在民族英雄？这种战争算不算民族战争？这个问题就有不同意见。譬如说，郑成功算不算民族英雄？我们认为郑成功是民族英雄。他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不在于他的抗清，而在于从外族手中收复了台湾。荷兰占领了我国领土，他收回国土，当然是民族英雄。譬如林则徐，算不算民族英雄？大家都认为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抗击的是英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不是抗击外来民族，算不算民族英雄？譬如岳飞，算不算民族英雄？他抗金，过去认为是二个民族，其实是二个政权的斗争。现在有人有不同意见。又如，文天祥抗元，史可法抗清，算不算民族英雄？他们当然是英雄，但英雄不同于民族英雄。这提得好。在一个民族内部中，两个政权的战争算不算民族战争？假如不算，那岳飞又是什么英雄呢？是否可称抗金英雄？文天祥是否可称抗元英雄？史可法是否可称抗清英雄？这当然都可以。除此以外，同样情况的人是否也可算英雄？例如岳飞，在宋政权来说，是英雄。但就金政权女真方面来说，兀术算不算英雄？起码他也应该是金朝的英雄。例如努尔哈赤，在杨镐派兵进攻时，他来抵抗，他算不算满族英雄？这当然应该算。他应该算是抗明英雄。当然明朝去镇压他，可以说是为了维护统一，但是明朝派兵去镇压他们，当然要抵抗。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总之，国内两个政权战争中出现的英雄可不可以叫民族英雄，这有不同意见。连带而起的还有，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属于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从理论上说，民族矛盾当然离不开阶级矛盾，但有许多情况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这也有不同意见，在许多具体的事件上，比方清初，许多明朝遗老属于明朝地主阶级，在清入关

后用干支纪年，而不用清朝年号。北方也不用南明年号。过去都认为是“气节”，都认为这是由于民族压迫。表面上看起来也有道理，但同样的情况，在辛亥革命后，所谓的清朝遗老，也就是清朝的地主、官僚。他们是汉人，但他们也不用民国的年号，而用干支。这算不算民族矛盾？他们阶级成分没有变，能不能算阶级矛盾？算什么呢？不用当时新政权的纪年，而用其他符号来代替，这开始于陶渊明。晋亡，宋建立后，陶渊明就用干支。但是他们都是汉人政权。可以说他反对刘裕的政权。这种情况在明朝、清朝应该怎样对待？过去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在许多小的，细节问题上都没法肯定。类似的情况很多，需要大家来讨论。朝代变换后，前一朝代的官僚不愿意和新朝合作，记载最早的是周灭商时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就是对旧政权的怀念，对新政权的不服从。

后来的情况是否都是如此。其实，仔细来看，完全不同。辛亥革命后与清军入关后，情况完全不同。不但那时情况不同。就是和陶渊明时也不一样。对伯夷叔齐时的社会性质，也有不同意见。那时汉族还没有，所以不能说是民族矛盾。也不涉及阶级矛盾。应该说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有清代的文字狱问题。过去我们认为文字狱是民族矛盾，是满族政权对汉人知识分子的压迫。是不是这样？还可以仔细研究。因为多数还是反抗当时统治，不服当时统治。实际上还是阶级原因，不能说都是民族矛盾。文字狱中也有很多满人被杀。不只是汉人。不是民族原因。又比方说清军入关后，全国所有的人都要剃发，都要穿满式服装，用满族的风俗习惯强加于汉人，这当然是民族矛盾。但有些就不一定是民族矛盾。比如圈地，究竟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圈地把明代的官方土地分给东来的将士，这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又比如清初顺治时的科场案，许多人认为这是对汉人的压迫。事实

是否如此，恐怕不见得。有许多在科场案中被充军到东北去的人，后来就写文章，如“长白山赋”，就完全是颂扬清朝皇帝的。丝毫的民族意识都没有。笼统地说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恐怕不适宜。我们得具体地、每一个事情都解释清楚。究竟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这次民族史讨论会就要把这些非常乱的特别是少数族政权下的各种问题，都要详细地分析一下。

还有一件事是地方史的讨论。今年地方志研究会就要成立。前两、三星期在太原开了筹备会。对于地方志，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有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过去对地方志的编纂，清代学者戴东原和章实斋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很厉害。前一派主张，地方志主要是地方自然环境及其变动的历史，关于地方上的人事，简单说一下就完了。就是说，地方志是地方的历史。章实斋则认为地方志应是地方上人事变迁的历史，涉及到人的许多方面。他写的文章、他作的诗，都应当尽量收录。我们可以看到，章实斋的说法是正确的。地方上的人，实际上是构成地方史的最主要内容。在那种辽阔而边远的地区，人很少，当然在地方历史上也不会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必须重视人。不过戴东原等人并不是反对写人，不过认为要少写。但按章实斋的意见，诗、文都应写进去，其分量在方志中就比其他方面大得多。现在出版的江西志，里面收的诗文多得很，是单独出书好，还是附在方志内，值得大家讨论。在地方史方面，现在有许多新兴的地方。这些地方是刚刚兴起来的居住地，有的成为城市了，有的还没有形成。比如说大庆，大庆石油工业发达起来了，农业也跟着发达起来了，人口也增加了，可是大庆过去的历史，不仅清朝没人知道，就是解放前也没人知道。要写大庆的历史，可是这方面的资料却一点也没有。日本人在东北经营了那么久，可是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俄国人在东北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个地方，而我们逐渐把这个地方

发展起来了。我曾说：大庆工农业那么发达，人口那么多，非设一个大学不可。这个大学除了共同要学习的课程外，关于地方的历史也要学。学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前天我到泉州，看到那么多的文物，大庆就没有这些个文物。今后修地方志，要和普查工作连在一起。不论在哪方面，都得普查。现在还有许多年纪大的人可以问问旧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再过几年这些人就都没有了，那时剩下的是外地来支援大庆的人，对大庆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这样历史就很难修了。所以普查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现在大庆多数人口都是外来人口，他们的语言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又构成了新的语言，这新的语言究竟象什么地方的语言，我也说不来。

关于风俗，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华民族的很重要的特征，但也不是拒绝外来的风俗。有位朋友是辽宁义县人，他谈到义县地区是汉、蒙、满三族杂居的地方，在语言上一致，面貌上一致，分不出来，只有在旧社会过春节时，才看得出哪一家是哪个民族的，因为各族的节日习俗不相同。这个例子很有启发性，所以对风俗必须重视。前天开会，很多华侨发表了很多爱国的议论。我想他们为什么那么爱国？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无论香港也好，南洋也好，都有许多风俗与祖国不同，所以他们怀念祖国。我们提倡爱国，为了使中国人出外不受歧视，必须使祖国强大。我们从古代诗歌中，一再看到怀念故土旧友，感慨离别。汉代、唐代的诗，古诗十九首，都提到了这种情况。“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就反映了怀念乡土的感情。中国人的特点是乡土观念重。虽然乡土观念重不一定都好，但却是中国人的特点。地方史的讨论，一定会涉及这个问题。中国有许多共同点，也有许多差异。我的意见是：应当知其异，察其同，知其分，察其合。共性与个性是连带的。我们既要知道个性，也须知其共

性。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在历史研究中就会有偏差。民族之间的不同有其不同的历史根源，我们也应当知道民族是如何融合的，不应忽略其中哪一个方面。

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意见也是存在的。汉唐元明清，对外交流多，中国对外国的贡献多。中国的四大发明是输出去的，但不是中国直接带出去，是经过其他途径流传出去的。明朝象郑和下西洋，当然是中国到外国去，但中国文化没有直接带出去。到了清代，交流也很多，所以有人认为明朝对世界的贡献大，有人则认为清朝更大。交流当然是有往有来。火药是由中国传出去的，造炮是西洋人带进来的，但是我们国家在康熙初年造的炮，比西洋人造的就大得多，有用铜的，也有用铁的。炮越重，射程越远，杀伤力越大，技术越先进。西洋人带进的炮，就没有那么大。当时派人出使外国，康熙就曾吩咐说，如有人问中国的炮有多重，不能告诉他。可是外国的东西传进来后，中国又有发展，有加强。国外的有些东西，如天文算法，中国就完全接受了。清朝就正式宣布采用西洋历法。而当时有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反对采用西洋历法。其实杨先生并不懂历法，康熙让他当钦天监，他一筹莫展，最后失败了。他写了一本书叫《不得已》，说传教士是文化侵略，用不正当方法征服中国，于是他不得不挺身反对。

明末徐光启，是中国的读书人，又是天主教徒，对天算是遵从西法，但他写《农政全书》主要是介绍中国农艺的，是用西洋方法整理中国的东西，外国的东西进来就必须和中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清初有一个画家吴历，不但是天主教徒，而且是天主教在南方的传教士。教堂里有许多圣母像，用西洋画法，他是清初最有名的六大画家之一，可是他并不因为自己是天主教徒，而用西洋画法。

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有一些是被中国全部接受，如西洋天文算法，采用西洋方法整理中国的东西。有的则不是这样。国外的东西进来，我们就应采取这种态度。中国的东西，有的是直接带出去的，有的是间接传出去，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研究的。不能完全排斥外国的东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例子的。除了不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东西，不符合人民需要的东西以外。

清初的天主教士常到宫廷中去，和康熙的几个儿子关系很好。如有一次，有一个皇子要传教士剃掉大胡子，传教士说，只要康熙皇帝下命令，他就剃掉。康熙知道后说，我只管政治，至于留不留胡子，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又如用矾水写字，用拼音写汉字，也是耶稣会士教给他们的。后来康熙的儿子们搞宫廷斗争，秘密通信就用了这个方法。清初不仅采用了西方天文历法等大的方面，就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也采用了西法。但康熙末年反对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徒不肯祭祖、祭孔。这说明康熙皇帝对国外文化的吸收是有一定的立场的，不是完全拒绝或全盘接受的。

以上谈了许多，主要是介绍一下当前的一些不同意见，也有一两点是我自己的意见。总之，在这两年中，我们历史学界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收获呢？有几点可以讲：

首先是解放思想，加强理论学习，包括哲学理论的学习，不只是政治理论。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受传统思想束缚很严重，这些束缚有传统的，有个人的，有时代的，有地区的，有习惯的感情的束缚，还有一个严重的束缚是年龄，象我是十九世纪的人了，辛亥革命时已有十二三岁了，旧的传统，年龄是很大的束缚。这种种束缚，我们必须根本去掉，求得解放。

现在尖端科学发展很快，如何用尖端科学来研究历史是一个

大问题。如历史中的中国人口问题，历史上记载很多，但现在有人认为这些记载是不可信的，因他们根据中国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看来，是养不活这么多人的。其实，明代有许多杂粮品种引进，并加以推广栽培，如甘薯之类。当时有记载陕南川北都是以杂粮为主。中国当时生产的米麦不够，但有杂粮补充，所以当时的人口数字并非虚构，也许这些人没有把杂粮考虑进去。前两年我们在河南发现一个六朝武库，其中有一柄斧头，南北朝时中国就有铸铁，后来用现代科学金相学方法进行鉴定，发现并不是铸件。前不久在新疆发现一具四千多年的女尸，保存十分完整，这具女尸早于埃及的木乃伊。埃及的木乃伊是用了药物进行保存的，五脏还去掉了。而这具女尸并无药物保护，但是保存完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尖端的科学来研究历史学，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过去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占用大量的史料，我们要善于整理发掘各种新的史料。外国人研究历史，采用电子计算机，把历史资料用计算机储存起来，这比我们先进，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工作者们还是作了大量的工作的，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对史料还要加以分析与鉴别，研究这些材料之间的辩证联系，多问几个为什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行的。

中国的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在研究中国史方面，我们应当走在世界前面，我们不但要走在前头，还要指导别人，而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因此，我们史学界应当加倍努力，特别是我们青年的一代，应当更加努力，树雄心把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